



主编：宋大川

常务副主编：朱志刚

# 北京考古志

## 房山卷

李伟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纪出版

上架建议：考古/方志

ISBN 978-7-5325-6461-3



9 787532 564613 >

定价：21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http://www.ewen.cc)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北京考古志.房山卷 / 宋大川主编  
李伟敏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25-6461-3

I. ①北… II. ①宋… ②李… III. ①文物—考古—概况—房山区 IV. ①K8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090409号

责任编辑: 缪 丹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富 强

## 北京考古志 房山卷

宋大川 主编 李伟敏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

- ( 1 )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 ( 2 )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 ( 3 )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插页: 34 印张: 19.5  
字数: 453千字 印数: 1-1,500 册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6461-3 / K · 1585  
定价: 218.00元

## 序

摆在我们面前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的内容，是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所确认的考古遗存，一般来说，可称之为《北京文物志》。但主编者或许是强调考古工作对认识这类考古遗存的考古学的作用，或许是认为“文物”这词的含义广于考古遗存，故称之为《北京考古志》。要知这一《北京考古志》讲述的内容，也就是北京市的考古遗存志。

摆在我们面前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依如下四个层面进行编写。这四个层面，就是这书的编写体例。

一是依北京市行政区划分卷，共计16大卷；

二是每卷依“概述”、“遗址”、“墓葬”、“其他遗存”、“考古研究”和“附录”几个板块，组成第二层面。

三是在“遗址”、“墓葬”和“其他遗存”之下，又分别依年代进行区分，形成第三层面。

四是在上述第三层面之下，再对所属考古遗存作出分述，构成第四层面。

除上述四个层面之外，还配备了图、照片和表。这样，可谓条块清晰，资料翔实，充分地表述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成果。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除了上述学术硬件外，还有软件，这就是各卷中的“概述”和“考古研究”。因为我一贯提倡学术自由，故在此不予以评论，但我认为：一是觉得有这些内容总比没有这些内容好；二是我相信各位著者总会认真对待这事，总会力图尽量地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当是一人之言，当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学术研究，总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是有了这软件，尤其是有了那些硬件之后，学术界还可进行自由讨论。要知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学术才能走向繁荣和发展。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有着这样的作用。

一是定将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将这些文物以《北京考古志》的形式公诸于世，将有利于文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部大法，保护好文物，也将促使有关部门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部大法，在这部《北京考古志》公布的文物所属地段及其周围策划动土或搞建设之前，该认真考虑是否可在这里，和怎样以及如何在这里动土或搞建设。总之，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之公布，夯实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的基础。

二是也夯实了北京市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将推动北京市考古学的研究。

三是将上述两者连接起来,北京市的考古学研究将可得到持续的发展。

总之,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之作用,不可不谓之大!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北京考古志》巨著,是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首创。我诚恳热切盼望全国文物考古研究单位予以效法推广这项可誉之为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

張岩培

12-4-2 於小石橋成稿

## 前 言

“国有史，邑有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史志的传统，三千多年来代代相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惟一的历史记载不间断的国家。方志作为一种记述特定时间和地域某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和彰显地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古都北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在挖掘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丰富首都城市的独特魅力方面，北京的考古工作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试掘开始，经过8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最近2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上至史前、下至明清时期的各种类型的遗址、墓葬等遗存。这些遗存广泛分布于北京的各个区县，是北京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建立了北京地区的考古文化序列，见证了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明清皇城的沧桑巨变。周口店遗址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琉璃河遗址见证了北京古城建都3 000年的历史，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丁家洼遗址、前后朱各庄遗址等是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燕文化的遗存。延庆玉皇庙文化是一支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等青铜遗物为代表的富有典型山戎文化特色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门头沟东胡林墓葬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遗骸填补了北京地区自山顶洞人、田园洞人以来人类发展史的一段空白。平谷区发现的上宅文化是迄今确立的北京地区最早有原始农业萌芽的史前文化。昌平张营遗址是北京乃至燕山南麓地区发掘面积较大、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为研究燕山南麓特别是北京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类型与谱系提供了翔实资料。昌平白浮村西周木椁墓随葬器物中的鹰首剑、马首剑、鹰首刀，铃首匕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管釜戈等的形制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特征，体现出中原青铜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在北京地区相互影响的痕迹。

西城区发现的大量密集分布的战国至西汉陶井群说明今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是汉代蓟城的城区所在。丰台区大葆台1号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西汉时期的“黄肠题凑”墓，为研究汉代贵族的丧葬礼制与墓葬形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石景山区西晋华芳墓中出土墓志说明西晋时期蓟城的西垣当在今会城门村稍东一带，进一步印证“蓟丘”处发现的残破城址即西晋蓟城。丰台区史思明墓与房山区唐归义王李诗及其妻合葬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的藩镇与羁縻州

制度提供了史料。

门头沟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代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证实了辽代陶瓷手工业的中心在辽的燕京地区,进而说明辽南部地区(燕云十六州)是辽代经济的中心。大兴塔林遗址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塔基发掘,印证了辽燕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和寺院的兴盛。丰台区发掘出土的金中都南城垣的水关遗址,首次获得了金代水利工程的建筑实物,填补了我国历史上金代水关建筑缺失的空白,同时也以实物资料印证了金中都南城垣的准确位置、走向以及部分河道的分布,丰富了我们对于金中都城建筑及工艺水平的认识。金陵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填补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缺环,对于研究金代陵寝制度以及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城区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中发现的门砧石上的铁“鹅台”,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与《营造法式》上记的大型板门的铁“鹅台”形制完全一样。东城区玉河遗址发掘出的明清时期河道泊岸及东不压桥遗存是北京中心城区唯一的古河道遗存,是研究北京历史水系规模、流向变迁的实证。

北京独特的历史地位造就了北京独特的文化魅力,而北京的方志则真实记录了北京历史发展的轨迹。北京地区现存的各种旧志多达百余种、千余卷,新编方志已出版300多部,成为北京地域文化的载体,为人们从不同角度认知北京提供了难以比拟的资料,在诠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独特文化内涵、传承弘扬北京历史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构成了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两翼,但目前尚无一部反映北京各区县考古工作和考古遗存情况的志书。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秉承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组织编撰了《北京考古志》,采用方志体例,依北京市现行的十六个区县分卷编纂,以卷统志,各卷中按考古遗存类型及研究分章,各章中按历史时段分节,节下再以遗存类型分目,对北京各区县的考古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京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了北京自有考古工作以来各区县各类考古遗存资料。该志书记述时间跨度大,内容全面丰富,图文并茂,既揭示了区县历史文化发展的共性特点,也体现了各区县独特的地域文化面貌,完整勾勒出北京地区考古文化的特有内涵和面貌特征。

《北京考古志》作为一部专门反映北京考古工作的大型志书,既能为深化北京地区的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也能为北京历史名城及古都城市历史遗迹保护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同时还能以考古资料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为北京史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实证资料。凭借各种考古资料,史学家可以重建和不断丰富北京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充分发挥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本书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科研成果,享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策划了本书的选题,审定了本书的文稿;朱志刚作为常务副主编,负责本书的组织、联系、协调、实施、出版以及日常工作;程利与王燕玲负责本书各卷的考古遗迹图的制定工作,盛会莲负责本书的秘书及事务工作;本书各卷由李伟敏、盛会莲、王燕玲、张利芳、朱志刚、程利著。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为本书作序,这是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巨大荣誉。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先生对本书的评价,激励着我们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凝炼深邃的考古学文化认识,提升和丰富学识素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编纂《北京考古志》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也是一项学术创新,但这一工作只是基于前人基础所作的新的尝试。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创新中发展进步的,学术研究也唯有如此才能打开更广阔的空间。本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深化,敬祈方家学者,多多教正。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 凡 例

一、本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并比较全面、翔实、系统地记述北京地区考古遗存的调查、勘探、发掘及研究情况。

二、本志记述的时间上限追溯到北京有考古工作之始,下限原则上止于2011年底。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2011年北京市行政区辖域范围,某些分志依其特定业务范围记述。

四、本志按北京市现行的十六个区县分卷编纂,以卷统志。各卷前设概述,尾设附录。卷中按考古遗存类型及研究分章,各章中按历史时段分节,各节下再以遗存类型分目。

五、本志收有北京市考古遗存分布图、各区县考古遗存分布图、各遗存位置示意图、各遗存遗迹分布图及大量的遗存平剖面图和照片等图和图版。

六、本志在全面记述北京地区考古遗存的同时,也注意记述学界对考古遗存的研究及认识情况。

七、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采用公元纪年。

## 概 述

房山区位于北京西南,东北与丰台区相邻,东与大兴区以永定河相隔,南和西南与河北省涿州市、涞水县相连,北与门头沟以百花山为界。

房山位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带,西部和北部是山地、丘陵,约占全区总面积的2/3;东部和南部为沃野平原。主要山脉有大房山、大安山、三角山、百花山、西占山等,均属太行山分支。最高峰是百花山的百草畔,海拔2 035米;最低处是东南部立教洼,海拔26米。境内有大小河流13条,拒马河、大石河回旋曲折,永定河、小清河穿境而过。

房山区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和活动。在周口店发现的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遗址,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距今20万年到10万年的“新洞人”、距今2.7万年的“山顶洞人”和1.8万年前的“田园洞人”的发现,显示了这里人类活动的延续性。

拒马河流域的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属于新时期至商周时期。距今3 000多年的西周燕都遗址,是周武王灭纣封燕之地,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开端。

战国燕时设中都县,县城遗址即窰店土城。

秦时在今房山地区置良乡县,属广阳郡。

西汉初置良乡、广阳、西乡三县。王莽称帝时,良乡更名“广阳”,西乡更名“移风”。东汉光武帝时,良乡复旧称,并复置广阳县。

魏、晋,及十六国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几朝,今房山地区良乡、广阳两县并置。北朝北魏、东魏两朝,仍设两县。北齐时良乡、广阳两县省,并入蓟。广阳县再未复置。良乡县于北齐武平年间复置,历隋、唐、五代至辽,历代相因。

唐时良乡县境内先后置6个羁縻州,属侨治州县。

金代在大房山建皇家陵寝,为守护陵寝,在良乡、范阳、宛平三县边地置万宁县,后改名奉先县。元代至元年间,更“奉先”为“房山”。明、清、民国,今房山地区一直良乡、房山两县并设。

1958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建北京市周口店区。1981年,房山县境内另设北京市燕山区。1987年,撤销房山县、燕山区,设立房山区。

## 一、房山区考古工作历程

房山区历史悠久,地下文物埋藏丰富。20世纪20年代,周口店遗址的发现揭开了房山区考古工作的序幕。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鸡骨山采集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1921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于又在第1地点发掘出土2颗古人类牙齿,至此周口店遗址开始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1927年起,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外双方合作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发掘工作。1927年,“中国猿人北京种”被正式命名,俗称“北京人”。1929年12月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震惊了世界学术界。1937年抗战爆发,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十年间周口店遗址完成主体发掘工作,获得了5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数万件石制品及上百种哺乳动物化石。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中国考古事业的初创期,周口店遗址的确认,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远古人类及旧石器的发现在学术界具有深远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工作进入恢复发展阶段,考古工作也开始全面展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恢复了对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最大的收获是确立了新洞为旧石器中期遗存。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对房山南部及拒马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商周遗址、窦店土城、广阳城址、长沟城址、丁家洼遗址等一系列遗存。197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对琉璃河商周遗址进行发掘,至1977年共发掘墓葬64座,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同期伴随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也颇有收获。1974年北京市文物工作在房山长沟峪金陵兆域范围内发掘清理一组金代石棺墓,1977年对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及地宫进行清理发掘,同时在清理发掘的几处窖藏中获得了一批精美瓷器。这一时期考古工作以随工清理的抢救性发掘多见,主动性发掘开始逐步开展,但还不多,学术研究也未系统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基础建设的考古发掘日益增多,带有学术目的的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80年代初,周口店遗址开始了多学科的综合性及石制品的专题研究,对周口店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使燕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热点。1986年再次对拒马河流域进行调查,发现20余处遗址,并在调查基础上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选择镇江营和塔照遗址进行了历时5年的发掘。在调查基础上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还对窦店古城进行试掘,明确了城址的年代及性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金陵遗址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与试掘,大体确定了金陵的位置。

2000年以后,随着主动性发掘的增多,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不断深入。2001年在周口店遗址发现田园洞。21世纪初对金陵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金陵的领域范围及主陵区的平面布局,探明了金太祖地宫形制及金陵的清代建筑遗迹,对金代皇陵的葬制有了一定认识。2005年至2006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的工作,对工程涉及的8处

遗址进行发掘,年代跨越从东周到明清,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为研究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历史文化增添了重要资料。这一时期,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大规模展开,考古发掘资料日益增多,研究工作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系统化和专题化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 二、房山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 (一) 遗址

#### 1. 史前时期遗址

史前时期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期。房山区发现的旧石器时期代表性文化遗存是周口店遗存,从早期的直立人、中期的新洞人到晚期的山顶洞人,经历了距今60万年到2万年的时间。

周口店遗址位于房山区西山,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周口店第1地点位于西山的龙骨山,属于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其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处于人类发展中的直立人阶段。和现代人相比,北京猿人的前额扁平,眉骨粗壮前突,吻部突出明显,其枕骨圆枕粗壮,整个脑骨小于现代人,脑容量仅现代人的80%,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由于长期直立行走,其下肢骨已基本具有现代人的形状。在第1地点发掘出土数万件石制品、骨制品、古人类用火遗迹和30多种中更新世时期的动物化石。石器以刮削器等轻型工具为主,砍砸器所占比重不大,加工方法以砸击法和锤击法为主,碰砧法使用较少。周口店第4地点、第15地点是旧石器中期文化的代表。在第4地点发现的“新洞人”化石,根据测量数据表明,介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在第15地点发现了大量石制品,其制作技术承袭北京猿人文化,但水平有所提高。山顶洞遗址和田园洞遗址是旧石器晚期文化的代表。山顶洞人的脑容量与身高均高于北京直立人,智力接近现代人。其特征为前额隆起,头骨壁较薄,前额部后缩,牙齿细小,是典型的晚期智人。山顶洞遗址发现的石制品较少,骨针的发现表明当时人类已开始缝制衣服,大量钻孔工艺品的发现体现了古人类爱美观念的产生。山顶洞遗址还发现了我国年代最早的墓葬,骨骼周围撒有红色赤铁矿粉的现象反映了最初的原始宗教信仰<sup>[1]</sup>。

房山区发现的旧石器时期遗址还有半壁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磁家务遗址等。半壁店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土有古生物化石,经鉴定有啮齿类、鹿类、犀类、马类等种类,时代为距今10万年前后的更新世中晚期<sup>[2]</sup>,与“新洞人”文化遗址同期。磁家务遗址发现于1987年,在遗址灰烬中发现有啮齿类及鹿、犀牛、马等的骨化石,遗址年代距今约10万年。

房山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代表性文化遗存有中晚期之交的镇江营一期遗存,新石器晚期的镇

[1]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2] 袁振新:《房山区又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址》,《北京文物报》1988年第1期。

江营二期遗存,铜石并用时期的镇江营三期、四期遗存,经历了距今7 000年到4 000年的时间。

镇江营遗址位于拒马河南岸,这一地带是旧石器时期古人类离开山区、走入平原的理想聚集地。遗址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共分四期,从新石器中晚期至铜石并用晚期,发展序列完整。镇江营一期遗存是新石器中晚期之交北京南部地区的代表文化,被发掘者命名为“镇江营一期文化”,实际当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初始阶段<sup>[1]</sup>。陶器以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红陶两类为主,器形以圜底器为主,釜、钵、壶为典型器物组合,装饰风格以素面为主。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有砍砸器、斧、磨盘、磨棒等,细石器和磨制石器较少。关于镇江营一期文化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是北辛文化北上后融合磁山文化的产物<sup>[2]</sup>。镇江营二期遗物延续了一期釜与支脚的组合,但数量减少;鼎的数量大增,体现了文化的进步。镇江营三期、四期遗存仅发现于台地上。三期遗存属于铜石并用早期阶段,出土的陶器以夹云母红褐陶为主,主要器形有罐、钵等,侈口鼓腹双耳罐、高领广肩罐、泥质红陶钵等与同时期的雪山一期文化相似。四期为铜石并用晚期阶段,四期的早段以素面泥质陶为主,罐类平底器占很大比重;晚段以夹砂陶为主,器形丰富,鬲、斝、三足器相对较多,显示了较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其年代下限已进入夏纪年<sup>[3]</sup>。

房山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还有丁家洼遗址、檀木港遗址、坟庄遗址等。其中丁家洼遗址和坟庄遗址持续时间较长,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商周以后。

## 2. 夏商周时期遗址

夏商周文化指从夏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文化,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221年。房山区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在考古学文化上包括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或围坊三期文化、商文化、燕文化<sup>[4]</sup>。

夏晚期到商早期遗存以镇江营商周第一期遗存为代表,主要发现于塔照遗址,为大坨头类型,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范畴。出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陶质中均羸云母粉及鬲多实足根的特点,区别于北部雪山、张营类遗存,显示了北京南部地区的文化特点。

晚商时期遗存以镇江营商周第二期遗存为代表,包括琉璃河遗址中的商代遗存等。镇江营商周第二期被称为塔照二期文化,后来一般被归为张家园上层文化或围坊三期文化。塔照二期文化承袭了塔照一期遗存特点,以夹砂陶居多,器表多绳纹。领部附加堆纹的花边高领鬲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体现了北方畜牧文化的南进。

西周早中期遗存以琉璃河西周早中期遗存和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为代表,属于西周燕文化。陶器多为夹细沙陶和泥质陶,以褐色或灰色为主,也有黑皮陶,灰陶比例进一步增加。盛行交错绳纹,也有附加堆纹、旋纹、划纹等。常见陶器有鬲、折沿甗、深腹盆、浅腹盆、小口瓮、壘、小口罐、甑、鼎、簋、钵等。居住址出土的陶器多为高大厚重的实用器,以褐陶为主。陶器中的联裆鬲也为周文化风格,袋足鬲和侈口厚唇簋体现了商文化的气息,高领罐和小口瓮又具有当

[1]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春秋》2007年第5期。

[2]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春秋》2007年第5期。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与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年代分期依照《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一文。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地土著文化成分。发掘者认为琉璃河西周早期燕文化的陶器为周文化、商文化、土著文化和混合文化四组因素共同构成,并认为前两组因素占据主体<sup>[1]</sup>。同样的文化组成也见于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可以说西周早期燕文化是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大量周文化和商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文化以琉璃河西周晚期遗存和镇江营商周第四期遗存为代表,延续了早期的燕文化。陶器大多数为夹细砂灰陶,袋足鬲、联裆鬲、高圈足簋多见,花边筒腹鬲和甗消失,褐陶大减,显示了土著文化因素的衰弱。

春秋中晚期文化以丁家洼遗存为代表,属于燕文化,与北京北部的玉皇庙文化区分明显。丁家洼遗址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流行绳纹,主要有鬲、盆、豆、罐、尊等器类。其中鬲分为袋足鬲和柱足的燕式鬲两类<sup>[2]</sup>。春器中晚期文化延续了早期文化特征,但代表周文化的高圈足簋的消失,标志了周王室的衰落。在丁家洼遗址东南的前后朱各庄村还发现了7座春秋时期陶窑,为竖穴升焰式结构,联系丁家洼遗址的发现可以推断,在丁家洼遗址及周围存在一个较大的聚落<sup>[3]</sup>。

战国时期文化以镇江营商周第五期遗存为代表,包括琉璃河战国遗存,南正战国遗存,黑古台遗址,窦店土城、广阳城址、蔡庄土城遗址、长沟城址等。陶器中的实用器以夹砂灰陶和褐陶为主,主要装饰绳纹。器形以釜为主,常见燕式鬲、尊、绳纹罐、小口折肩瓮等容器,以及建筑构件筒瓦、板瓦、饕餮纹半瓦当、井圈等。礼器基本为泥质灰陶,常见旋纹、螺旋纹、云纹等纹饰,主要器形有鼎、豆、壶、盘、匜等。战国燕文化与春秋燕文化一脉相承,继承了春秋时期的器形,略作改变。房山境内发现的四座古城址,从夯土墙体及出土遗物判断,均创建于战国时期,主要承担军事防御性的职能。窦店土城距董家林古城3千米,城址分为大城、小城两部分。大城初建于战国早期,晚期进了全面整修与加固,发掘者认为其为东周燕国中都城址,是燕国为了抵御齐、赵而建<sup>[4]</sup>。

### 3. 汉代遗址

房山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城址、窑址、手工业作坊等。

汉代城址有窦店土城、广阳城遗址、长沟城址、蔡庄土城遗址,均发现于1958年的文物普查中,其中窦店土城、广阳城址曾做过试掘工作。四座古城均创建于战国时期,在汉代继续沿用。窦店土城大城近方形,分内外两层城墙,两墙间距16.9~19.5米。南墙全长1230米,东墙复原长约1040米。窦店土城西汉时修筑了大城内墙的护坡,东汉时铺筑了环城道路。窦店土城即汉代的良乡县城<sup>[5]</sup>。广阳城址基本为方形,周长2400米。从地面采集物判断,该城始建于战国,汉代继续沿用。从《水经注》等文献记载考证,其西汉初为燕国属县,宣帝时改属广阳国广阳

[1] 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1号——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1号——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4] 叶学明、陈光:《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

[5] 叶学明、陈光:《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

县<sup>[1]</sup>。长沟城址平面呈刀把形,周长1 720米,根据采集遗物及《水经注》的记载,推断为汉代西乡县古城<sup>[2]</sup>。

汉代陶窑主要发现于长沟镇南正村、周口店娄子水村及张坊镇北白岱村。南正村发现7座陶窑址,数量最多。Y1由操作间、火门、窑床、窑室组成,出土夹云母红褐陶的陶釜、陶罐、陶瓮等,具有典型的西汉早期特点,Y1当为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陶窑。Y5窑室近椭圆形,窑室后壁东西排列5个烟道,出土有夹砂含云母灰陶釜,年代当晚于Y1。除上述升焰窑外,还发现两座倒焰窑。Y6由操作间、火门、火膛、窑室、烟道组成。窑室呈长方形,窑室后壁有3个烟道,出土有陶釜、陶瓮等。结合河北和陕西等地发现的汉代陶窑,这种长方形窑室、3个烟道的陶窑结构年代当在西汉中期以后。

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址发现于长沟镇北正村,遗址发现两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大型灰坑,出土有夹砂红陶釜、红陶盆及瓮等陶器残片,陶质及种类单一。根据发掘者推断,遗址当为战国至汉代的一处作坊,为烧制专类陶器之所<sup>[3]</sup>。

房山区境内发现的其他遗址有常庄遗址、新街遗址、南洛遗址、南尚乐遗址、大高舍遗址、大韩继遗址、瓦井遗址、黑古台遗址、交道遗址、坟庄遗址等,均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所获。在1986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北尚乐遗址、南白岱遗址、塔照遗址、镇江营遗址和独树遗址等。除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外,其他遗址均未作发掘工作。2009年在房山区田家园小区工程中发现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遗址区,目前未作发掘工作<sup>[4]</sup>。

#### 4. 晋唐时期遗址

晋唐时期战乱纷繁,发现的遗址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城址及宗教遗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址有长沟城址和窦店土城,都在前期基础上继续沿用。北魏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人口锐减,窦店土城弃大城不用,在大城内修筑小城,将小城做为北魏的良乡县治<sup>[5]</sup>。隋唐五代时期的城址目前发现有7处,窦店土城、长沟城址为延续前代的建筑,西关上城遗址、东关上城址、黑龙关城址、霞云岭城址及良乡故城均为唐五代时期新建,但未作系统考古发掘<sup>[6]</sup>。

晋唐时期宗教遗迹有房山石经、雷音洞隋代佛舍利。房山石经始刻于隋,由静琬法师发起,后在其弟子的主持下续刻,隋唐时期共刻石经100多部,经板4 000余条,分藏于石经山上9个石洞内。五代时因战乱停刻,至辽代续刻,经金、元至明末绵历千年刻造不断。1981年在石经山雷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

[2] 冯秉其、唐明云:《房山县古城址调查》,《文物》1959年第1期。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市考古发掘报告第1号——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房山区田家园小区二期项目考古勘探工作报告》,载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房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5] 叶学明、陈光:《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8期。

[6]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科学出版社,2008年。

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汇编》。

音洞还发现了一件隋代舍利石函,内有2粒佛舍利。石函盖上刻有隋大业十二年及明万历二十年的铭文,为明代万历年间重藏于此。此外,1990年对天开塔地宫进行发掘,根据地宫内小塔铭文,证实天开塔为唐代创建,推翻了辽代建塔之说<sup>[1]</sup>。

#### 5. 辽金元时期遗址

辽金元时期遗址主要有城址、塔基遗址、窑址等,体现了这一时期人口增多、佛教兴盛、手工业较前代有所发展的特点。

辽代城址有良乡故城、穆家口城址。良乡故城为辽代时期赵德钧所建的良乡县城,周长4300余米,开四个城门,街呈十字形,后代多加修筑,一直沿用至明清。穆家口城址相传建于辽,金代继续沿用。

金代城址中良乡故城沿用前代。房山故城建于大定年间,为十字街形,开四个城门,建制与良乡故城相同。这两座城址均沿用到清代<sup>[2]</sup>。

辽金时期塔基遗址有云居寺南塔基遗址、天开塔地宫遗址和北郑村辽塔塔基遗址。2006年对云居寺南塔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出南塔塔基及其地宫一处。根据塔基的形制、结构以及用砖材料,初步判断该塔始建于辽代。南塔又称“压经塔”,20世纪50年代在南塔基旁的藏经洞内发掘出万余块石经,其中近半数为辽代所刻。20世纪70年代对北郑村辽塔及地宫进行清理发掘,出土大量佛教供物,包括石函、石幢、陶幢及各式银器。其中还发现有“大蕃”年号纪年砖,为研究辽代国号提供了新资料<sup>[3]</sup>。20世纪90年代对天开塔地宫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佛教文物及辽代木桌椅,其中发现的木桌椅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木质家具。

辽金元时期窑址有西周各庄陶窑址、天开塔砖窑址和磁家务瓷窑址等。2005年在南水北调房山段工程中发现西周各庄窑址。该窑由操作坑、火门、火膛、窑室和排烟设施组成,窑室呈半圆形,窑室后壁有两个烟道,出土有陶器、瓷器及少量铜钱,根据窑的形制及出土物判断窑址年代不晚于北宋中期。1985年在韩村河镇天开村发现天开塔砖窑址,出土有辽代沟纹残砖,据传该窑是为天开塔烧砖而建。1981年调查发现的磁家务窑址是北京地区仅次于龙泉务窑址的又一处辽金时期瓷窑址。从地表采集物看,窑址创烧于辽代,其时多产民间粗瓷,以青釉瓷碗为多。此窑于金代兴盛,产品受定窑影响,多白釉碗、盘,装烧方法有涩圈叠烧、覆烧等,于元代停烧,是北京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处瓷窑场<sup>[4]</sup>。

#### 6. 明清时期遗址

明清时期遗址主要有城址和寺庙宫观遗址。

明清时期城址主要有良乡县城城址、房山县城遗址等。良乡县城位于良乡城区,为五代赵德钧所建。房山县城位于城关街道,始建于金,两城均于明隆庆年间垒筑砖石,之后城内屡有增建。

明清时期寺庙宫观遗址数量众多,其中经考古发掘的有水头村尼姑塔塔基和青龙湖镇大苑村

[1] 沈书权:《天开塔出土佛舍利之谜试解》,《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2]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科学出版社,2008年。

[3] 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

[4] 赵光林:《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窑址》,《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